



诚人笃行

CHENG REN DU XING

王力 著

沈从文

的人生交游

SHENCONGWEN DE RENSHENGJIAOYOU

恩怨沧桑

中国近现代名人交往丛书

方忠/主编

人民出版社

诚人笃行

CHENG REN DU XING

王力◎著

沈从文的人生交游

SHENCONGWEN DE RENSHENGJIAOYOU



恩怨沧桑

中国近现代文坛名人交往丛书

方忠/主编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陈来胜

责任编辑:孔 欢

装帧设计:张新勇

版式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诚人笃行:沈从文的人生交游/王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交往丛书)

ISBN 978-7-01-015524-1

I. ①诚… II. ①王…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5371 号

诚 人 笃 行

CHENG REN DU XING

——沈从文的人生交游

王 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196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5524-1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在胡适、鲁迅的眼里，他都是最有前途的中国小说家，他与这两个人的关系却一热一冷，其小说创作成就举世公认，却长期淡出世人的视线之外。

他有非常优秀的学生——小说家汪曾祺，有挚友如诗人徐志摩、教育家杨振声以及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有一度联系密切而后来产生隔膜的朋友如丁玲、萧乾。他和这些人的交往，折射出作家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复杂处境和心境。

他没有读过大学，甚至没有读过中学，最后成为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的教授，和著名教育家杨振声、朱自清一起编纂了颇有影响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年改业，又成了著名的文物专家。

本书通过沈从文与熊希龄、胡也频、丁玲、徐志摩、胡适、杨振声、鲁迅、周作人、巴金、萧乾、汪曾祺等人的交往，力图还原一个鲜活丰满的人，即站在他的一千多万字之外，从容生活的沈从文。当然，与他一生相伴的张兆和女士，写在本书最后。

这样的写作目的，基本还原了他从湘西走出，在中国南北辗转迁徙，最后寂寞谢世于古都北京的轨迹，大概最足以像他墓碑上刻着的两行文字：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目 录

CONTENTS

“我想独立” / 1

——沈从文与熊希龄

“他胆小怕事,怕受连累” / 18

——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

“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 / 44

——沈从文与徐志摩

“总还是个够得上叫做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 / 62

——沈从文与胡适

“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 82

——沈从文与杨振声

“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 106

——沈从文与鲁迅、周作人

“我多么羡慕他” / 132

——沈从文与巴金

“我和三十年代以来的这位恩师总算和解了” / 154

——沈从文与萧乾

“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 176

——沈从文与汪曾祺

“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 / 200

——沈从文与张兆和

后 记 / 223

“我想独立”

——沈从文与熊希龄

晚清局势板荡，太平天国的旗帜在南中国纵横十四载，终于偃伏。第一批在硝烟中爬上南京城墙的湘军将士，是农民起义的埋葬者，其功过只能由后世史家来评说；他们也是晚清王朝的挽救者，受到封赏是自然的，其中之一便是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由卖马草的农民而入伍，凭勇力搏性命越过战争，22岁便任职云南昭通镇守使，4年之后擢升贵州总督。然而祸福相因，不久即因伤病复发返回老家凤凰，卒于29岁。他所留下的一份光荣与一份产业，为后嗣在本地地方占了一个优越的地位。熊家与沈家，起于湘西分于湘西，还承袭着老一辈在政界军界的光荣，到了民国就要踏上另外的道路各竞生存，却都与文相关。——武人的后代以文立世，这几乎是中国历史的通例，似乎也是因为这个通例，在普通中国人的记忆中，文人的名字比武人多得多。当然，这也是因为文人的遭遇普遍坎坷得多而又只能享得身后名，颇能引发境遇普遍不理想的芸芸众生的共鸣和想象。从祖父到沈从文，三代从军，将军梦破灭，转而习文，终于在文学界放一光彩，那要到民国二十年后才见分晓。凤凰小城的另外几个军人世家，始终在湘西乃至湖南军政界举足轻重，而且姻亲关系复杂，甲午海战那年中进士的熊希龄，则把湘西几大家族的影响拓展到北京。

北京，是沈从文与熊希龄的人生交合点，或者不妨说，他们的交往是中国近现代政治与文化的各个层面交错并生的一个缩影。熊希

龄赈贫济弱,是为务实的慈善事业;沈从文书写优美人性,则是导人向善的务虚功业。他们各在政治权力的疆域之外拓出一片文化空间,以不同的侧面和形式彰显了湘楚文化勤俭质朴、醇厚自信的风尚性情。



出使西洋时期的熊希龄

辛亥以后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熊希龄担任总理组成第一任“名流内阁”,此时沈从文还陶醉在逃学的快乐中。熊希龄左右受到掣肘,不久辞别政坛,转向慈善事业,其生活空间主要在北京;少年沈从文从军的一站,便是熊家安居的湖南芷江。熊希龄不仅在此建有公馆供母亲和弟弟居住,还把第一个女儿的名字取为“芷”,以慰乡思。五四运动爆发在北方古都,沈从文一无所觉,刚刚到达芷江县团防局做个小小办事员,主要职务是征收整个城里的屠宰捐。

熊希龄的三弟是沈从文的姨夫,

曾经有意招沈从文为婿,虽然翁婿名分未成,他家里的藏书却给沈从文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沈从文曾经在熊公馆勾留过一年半左右,按照他自己的回忆,“在那个院子中享受了一个夏天的清寂和芳馥”。沈从文走向现代文学的起点也在这里,他从楼上的两个大书籍中发现了一大套林译小说,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都是在那个寂静大院中花架边台阶上看完的。这些小说对于沈从文仿佛良师兼益友,给了他充分教育,也给了他许多鼓励,因为故事上半部所叙人事的一切艰难挣扎,和他自己的生活情况

本有很多相似处,他甚至揣想着自己的人生下半部是否如书中所写,顺利发展。书箱中另外还有十来本白棉纸印谱,引导沈从文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他后来之成为文物专家,也和熊家有着不可分的因缘。熊希龄年过五十后偶然画的墨梅水仙,在少年沈从文看来,风味极好。

这个客厅中另外悬挂的一些字画,大多是民国初年熊希龄为老母在北京办寿时收下的颂祝礼物。有章太炎和谭延闿的寿诗,还有其他几个当时名人的绘画。家中陈列无金玉古董而多时贤手笔,沈从文当时并没有多少感觉,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定是熊希龄精心选择的结果,示乡梓以富不如示之以德。其中有一幅是大总统黎元洪的五言寿联,字大如斗,气派豪放,联语仅十个字:“有子今人杰,宜年世女家。”三十年后,熊希龄辞世已届十年,这十个字在沈从文的印象中还很鲜明。熊希龄在十七岁的沈从文心中留下的印象非常特殊,文人风度有之,官员风范亦有之,亲近和疏离并存的情感大概是他们此后交往的基本特点。这和熊希龄长期处于文化中心北京那个遥远的大城有关,也和两家日渐悬殊的境况有关。当沈从文在湘西各地以小小士兵身份辗转漂泊时,熊希龄曾经返湘联系赈济灾民事宜,在芷江有所逗留,沈从文却从未对此着笔,一方面说明当时二人可能未曾见面,另一方面则说明少年沈从文还未进入成功人士熊希龄的视野。

缺皮少页的半本《新青年》,给 20 岁的沈从文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决然到了北京,最先见到的两个亲戚是大姐沈岳锬和姐夫田真逸。田是熊希龄的嫡亲外甥,刚从盐务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也不想去找舅父帮忙。听到这个惯于逃学的人要来认真读书,而且要读大学,姐姐他们不禁大笑。几天后,他们给沈从文留下 30 元钱和一些被盖杂物返乡了。沈从文在西西会馆的小房间住了下来,后来为了靠近北京大学,他在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找到一个由贮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一床一桌之外旋身都很困难,后来以“窄而霉斋”



青年时期的沈从文

的名字为世人广知。不过,1922年的秋天,新文化运动已经稳住脚跟而没那么浮躁喧嚣,文化人群落渐显壁垒,沈从文闯进了一个有无限希望也有无数争端的大城。

沈从文所住的西西会馆,正是当年熊希龄到北京参加会试时落脚的地方。这会馆由湘西永靖各府共18县的私人捐款筹建,湘西人到京后大多居住此间。民国三年,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曾经住在这个会馆里,悄悄组织了个“铁血团”,企图刺杀袁世

凯,不成功便流亡关外。熊希龄是沈从文的姻亲,是袁世凯拉上台又赶下台的内阁总理,于家于国,他们的关系都有点像历史传奇剧的剧情。

从总统府到天桥,从京兆尹到小店员,都是陌生的,街上见得最多的是骆驼,带着满身风沙沉缓地走过。翻开报纸,除了议员的意见和新闻,就是学生的消息了。这些人和他同住在一百万人的大城里,却仿佛很抽象的东西,离得极远极远。那两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实报》每日新闻都有坍塌砸人的消息,沈从文的小房间潮湿得生了霉。一起来京求学的“满伙计”(后来沈从文小说《雪晴》中队长的弟兄),一个地主小儿子,肺病已入第二期,语声沙哑,天天想家,念念不忘家里的老母亲、菜园、碾坊和白狗。沈从文手和心都空空的,他想着今天和明天,伙食如何解决。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也没有一本书能给予指示。

会馆四合院里住的同乡也让沈从文茫然,卸职候差的科长,报考落第的穷学生,退伍的小军官,领少额干薪的挂名部员。夜里到处都有咳嗽声,从声音即可辨别得出有多少是老病。住正房管会务的叶

老表，常年躺在烟盘旁边，小火炉上还经常炖有猪蹄膀下酒，二太太手上头上金饰也亮灼灼的。长班小二瘦瘪瘪的如一片干姜，终日在各个房间串动，就算买两个烧饼也会从中克扣一点钱，买煤球照例拿七十斤充一百斤。生命或生活，既为雨水固定在会馆中，似乎有所等待，其实等待的只是“不可知”。一面茫茫然半天半天的站在会馆门前欣赏街景，一面又回到湿霉的小房间里，无聊地看着床前的绿苔和墙壁上的水渍。故乡那些士兵和百姓，唯其已经远离，反而栩栩如生，这种痛苦记忆，竟然成为沈从文最大的快乐和精神支柱了，此后沈从文的“湘西”始终混合着真实和幻念，掩去现实痛苦阴暗的一面，而保留着童话一般的美丽与静穆，即由此而来，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变化真是奇妙。沈从文后来不无自嘲地说：“搔不着痒处的赞美，实在比有意的讥讽还令人难受。”很多对沈从文与熊希龄交往经历的揣测，也适用这句话。

临近春节，沈从文已经囊中空空，且无处求告。住在西城时，有一个每到黄昏即摇铃铛串街卖煤油的老头儿，因为经常从他那儿买灯油而熟悉，沈从文向他借两百铜子，才度过了年关。这个人沉淀在沈从文的记忆里，后来演化成《边城》里的老祖父，一个充满善意为世人撑了50年渡船的老人。沈从文此后尽力帮助萧乾、汪曾祺那样的年轻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卖煤油的老头儿曾经传递给他的善良心意，不同的生命由此到彼所得到的间接助力，有时就像两百铜子的影响那么深远。林宰平和熊希龄对于沈从文一生的影响，也与此相似。只不过，林宰平在精神上给沈从文以自信，熊希龄给沈从文提供了短暂的物质帮助。

熊希龄其实一直在沈从文的视野中，他的大舅黄镜铭，也就是画家黄永玉的祖父，此时正在帮助熊希龄建设香山慈幼院。他连大舅都不愿意求助，何况亲戚关系还隔了不止一层的人。沈从文到北京后没有去向熊希龄求援，大概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他的大姐夫田真逸是熊希龄的嫡亲外甥，在北京盐务学校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便回

家乡，后辗转各地。要么是他曾经告诉沈从文求告无用，要么是他的倔强影响了沈从文。青年人的自尊有时可能偏狭，在困境中仍坚持自尊则是成就事业的良好品质。从后来沈从文不堪香山慈幼院的人事倾轧而离开，也可以看出其性格方面的深层原因。其次是熊希龄方面的原因。熊希龄虽然组织人才内阁失败，离开官场后仍想有所作为，他创办香山慈幼院，可见一斑。无论如何，熊希龄在当时的北京都算一号人物，沈从文家境早已败落，地位相差悬殊，自然不会觊觎去求上流社会的远门亲戚。何况他在芷江时被一个女子骗去卖祖屋巨款的事，是他的舅舅和熊家都熟悉的，沈从文可以忍受贫穷和寂寞，也可以忍受误解而不作辩解，因鲁迅误会丁玲的笔迹和他相似而不主动解释，就是一个例子。自尊，让他在困境中不失本心，又只能在孤立无援中苦苦挣扎。

不过，当沈从文确实无路可走，推荐者又是他所敬仰的林宰平、梁启超这些人物时，香山慈幼院便是一个可去的暂住之所了。

不少人从郁达夫为沈从文抱不平的那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一封信》，推测沈从文有一身傲骨，不愿攀附熊希龄。文学家的话有时是激情洋溢的产物，郁达夫当时经济上也不宽裕，他自己身上那股压抑不住的名士气，很容易使他对家财丰裕者持鄙视态度。沈从文与他在餐馆中的交谈，可能因为年轻人饱受挫折和冷眼的激愤夸大了某些事实。所以，郁达夫在文章中说那位同乡兼亲戚的“老H”（熟悉历史掌故的都知道，指的是熊希龄），在慈和的笑里含着“尖刀”，不妨去偷他，显然是混合了两个人激愤情绪的措辞。

1974年，沈从文在给大哥和杨国勋的信中，都提到了早年受熊希龄帮助的真实经过：“到北京不久以后，对付日常三顿也拖不下去时，又像是得天保佑，给我们那位同乡亲戚，熊希龄找去，给我另外一种生活和教育安排。”看来还是熊希龄主动找到了沈从文，并且给予帮助。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承认熊希龄不仅给了他物质生活上的帮助，还安排了他的教育进修，这不仅是指去香山慈幼院的图书馆

做管理员,还应该包括熊希龄不久即派他去北京大学图书馆,跟随后来去美国的袁同礼学习书籍编目。沈从文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常常涉及古籍考证,最典型的是对世传展子虔《游春图》的考辨文字,与这时期的图书版本编目训练,实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林宰平和梁启超等人固然有推荐之功,最后主动伸出援手的还是熊希龄。沈从文早年关于香山慈幼院的一些文字,往往使读者觉得他在那里多受倾轧,以致最终跑到城里小公寓住下,继续蹭朋友饭努力读书写作。把沈从文自己的一些书信拿来比较,可以发现,也未必如此简单。正是沈从文自己的记录前后跨度比较大,而说法渐变,人们对他与熊希龄的交往也就多以他为中心,而有意无意把熊希龄置于被质疑的角色地位。

不少文章提到沈从文不接受姻亲熊希龄提携的原因,沈从文自己也多次说不会去找他,基本上是符合沈从文本人立场的,那就是要自立,努力挣脱本来已经非常复杂的家族亲戚关系网络。不过沈从文自己也承认,熊希龄“对我很好”。他到香山慈幼院之后,住在双清别墅附近,别墅本来是乾隆的一处行宫,悬空的古典建筑,采用乾隆最喜欢的楠木做廊柱,沈从文住在靠近山门处已经比较破旧的漱芳斋,门前有一棵大概七八百年的古树,沈从文每天就坐在树下看书。双清别墅是熊希龄处理慈幼院事务的地方,因此没有家人陪同,只他一个人住,这应该是他晚上常找沈从文谈话的重要原因。或在古松下,或在经过沈从文住所去香山寺废墟途中的石级上,或在熊希龄的双清别墅里,时事、哲学乃至社会情形各有涉猎。

无论从沈从文成年后的谨慎行事来看,还是从当时他和熊希龄的年龄地位差距,在与熊希龄谈话时他都应该是听多而言少。沈从文的大舅黄镜铭曾经对熊希龄提过沈从文,有祈求提携之意,沈从文晚年回忆说自己在年轻时之所以生活艰难也不主动请求熊希龄的帮助,是想独立,这只是晚年的说法,或者说是自尊心逼出来而逐渐被自我强化的倔强表达。因为虽然熊希龄待他不错,但是香山慈幼院

的一些管理人员却常常对他白眼相加。这就使得沈从文对熊希龄及其周围的上层社会，总是怀着一种混合着既自卑又努力自尊、既企羡又常常不满的复杂情绪。这种情绪其实在他早年以至中年对鲁迅的各种评价中也一再流露出来，他常以被人颂扬的“乡下人”自称，其实也是这种混杂情绪的产物。

郁达夫对沈从文的早年影响很特殊，不仅在于一饭之恩，还在于其自叙传小说笔法，在虚构的故事中大量加入自我生活经历和心理感受，自我所受的委屈往往是放大的，曾经广受精神苦闷的青年读者的青睐。沈从文在香山时期的小说也是这个风格。熊希龄 55 岁寿辰时，宴会盛大，沈从文也去参加了，他事后写下《用 A 字记下来的事》这篇小说，描绘了豪华的宴会场景，还流露了一种屈辱的心态，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重要的自己跑来凑趣的客，寿面、寿酒是搭到别人得一份——就是特为我预备一份，要我用五点钟以上的难堪去换取”。沈从文在熊希龄的视野里并不特别显眼，而熊希龄在沈从文的早年北京生活里非常重要。沈从文之所以终生感念徐志摩而对熊希龄略有嘲谑，盖出于他的敏感、自尊和自卑。

至于真正导致沈从文不辞而别，离开香山的原因，是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两篇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都与他在香山慈幼院遭受的白眼有关。小说不过是借以宣泄愤怒的载体罢了。

香山慈幼院当时的教育股主任是曾经留学日本的肖世钦，此人善于弄权，日伪时期当上了河北省伪省府教育局长，成为文化汉奸。他和沈从文自然是互相看不起，沈从文把他比作一个“狒狒”。和这个“狒狒”一道在香山看戏，发现剧场正中有空着的座位，沈从文不明所以就走过去坐下，而“狒狒”则只拣后面的座位。后来“老爷”引了两个“小玩物”到前排来了，专门留着的空座上“即刻就填上了两个奇丽肉体”。旧棉鞋底已经烂掉却无钱换新的沈从文没有眼色，处境越来越困难，对肖世钦等人有怨，对熊希龄却无法明言，索性一走了之。

从1924年董秋斯给沈从文的一封信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人对事的情感方式,这封信在抗战南迁舍弃众多物事、新中国成立后四次遭抄家的情况下还能够保留下来,足见沈从文的重视。录其内容如下,可以侧面窥知沈从文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来信一字一句我都了解,都深深的感到:真一兄是我顶好朋友中之一个,他所嘱托我的事未尝不尽力为之:为了这两层原故,使我连回一封信的勇气都没有,所以沈(沉)吟到现在。我写到此处,深信你已经能明了我的一切了。不多说罢。

你会喝酒不?我们应当齐入酒之宇宙。十天以后,放了寒假,我打算备个小东,请你喝两碗白干,慢慢的一同商量个活着的道理。你如果还有这一点子闲情,请回我几个字。

董秋斯是沈从文姐夫田真逸(即信中“真一”)的朋友,时就读于燕京大学,后来成为翻译家。信末署名为“难友”,寓意当指他们都是为“活着”而挣扎的难友,按此信中透露的信息,沈从文曾经就求学或者经济困难联系过董秋斯,而董作为一个穷学生均无能为力,只能以两碗白干致歉兼互相鼓励。沈从文此时的窘迫可想而知。据董秋斯女儿董之林说,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仍然经常去他们家,“文革”开始后他们兄妹被下放时仍然如此。董秋斯1969年底去世,沈从文从湖北干校返京后还经常去看望董秋斯患病的夫人,盖在于他们不仅是文学上的同道,更是在贫寒时结交的朋友。从沈从文与董秋斯、熊希龄的交往,不难看出他对人情的理解和执守,本无亲缘或利害关系的人给予落魄者某些安慰或支持,足令他感念终生;本有亲缘或利害关系的人对于落魄者未及时施以援手,落魄者可能长期耿耿于怀。只有等到沈从文境遇平顺且年事更长的时候,才能对和他有乡谊兼姻亲的熊希龄有更客观的评语。沈从文不是圣者,年轻时更不是,人们之所以在看待他与熊希龄的关系时免不了替沈从文抱屈,其实缘于常见的由果溯因思维方式:一个后来大有成就者当初不应该如此委屈的。其情可感,却也往往是误解事实的开端。

沈从文离开香山后的《给璇若》一诗，反映了他当时的复杂感受。璇若是他的笔名之一，这首写给自己的诗既有向人诉说衷肠的色彩，又有以此明志的意味：

难道是怕别人“施恩”，
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
独飘浮于这冷酷的人群？
竟不理旁人的忧虑与挂念，
一任他恁气或狂癫，
——为的是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独立是事实，因为他此后凭借在窄而霉的小斋中流着鼻血的辛苦写作撞开了文坛的大门；他在与人交往时摆脱不掉那种自尊与自卑混杂的情绪也是事实，他当时不仅怕接受别人的“施恩”，更感觉人群“冷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沈从文在给多人的信中说，他当初在北京努力多年后出版的《柏子》，终于突破了那些以亲戚、同乡、同学形成的文学集团的重重门槛，靠他一只手，在进京6年之后，把原来五四文坛大将们的阵容搞乱了，甚至说是搞垮了，不仅出版了十来本书颇得好评，还进入大学去教书。这不免有自夸之嫌，也许是当时绝大多数现代作家都被否定，复课的大学中文系只讲鲁迅，而港台很多书商盗印他的著作，销路很好，海外又有不少人都在研究他，所以才在给友人的信中宣泄长期被文学史雪藏的不满，顺带着把迟迟不接纳他的二三十年代文坛痛扁一次。

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对于世事和世情的评价，比飘零困窘时要宽和得多，也理智得多，不平之气会随人的境遇改善而淡化、消解。沈从文后来专门写文章悼念熊希龄，评价颇高，也有境遇变迁导致心态变化的因素。

应该还有一个人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那就是胡适。1921年10月9日，胡适在游香山园时，适逢香山慈幼院周年纪念大会，他应熊

希龄之邀发表演说。熊的夫人朱其慧是胡适好友朱经农的姑母，1922年4月2日，胡适与朱经农同到香山，住进了双清别墅。胡适在与熊希龄交谈后，劝熊氏作年谱或自传以熏导世风。他赞同熊希龄的慈善举措，自然也会影响到沈从文对熊希龄的态度。

从坊间传说的沈从文与高青子情感纠葛，应该可以发现30年代沈从文与熊希龄的关系密切了许多，他多次去拜访熊希龄才得以和高青子结识，撇开高青子不谈，这里着重探究沈从文对熊希龄的态度改变，原因应该是“一二·八”事变后熊的倾尽家财捐助抗战。熊希龄当时慷慨激昂：“淞沪之役，我十九路军将士奋勇杀敌，捐躯赴死，不少人连命都丢了，我捐点家产又何足惜！”这种男儿血性在沈从文身上也屡屡呈现，他热情书写那个嫉恶如仇的年轻军人“虎雏”，即可见其性情，熊希龄的现实义举应该是更令他动容的。1933年，沈从文携新婚妻子重新在北平安身，经常去熊希龄府上走动，吊诡的是，当初的疏远使他的人生道路逐渐畅达，此时的亲近又使他陷入婚外恋的窘境。此是题外话了。

从他的家信可以看出他与熊希龄的关系亲近了许多。1933年9月17日，他结婚还不到10天，在给大哥沈云麓信中写道，熊希龄的小女儿很快将返湘一行，至沅州后可能再回凤凰过些日子，而且她说过，如果到凤凰，就和沈从文的母亲同住一月。这说明原来地位悬殊的两家，因为沈从文已经在外站住脚跟，且与熊希龄交往颇多，已经恢复了比较融洽的姻亲关系。9月24日致大哥信中又提到：熊希龄的小女儿将要回湘，“闻至沅分家后或将过凤凰小住数月，曾托其带回一对菠萝罐头四筒，大约当在腊月始可收到耳”。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此时沈从文与熊家的联系比较密切，不过七八年光景，他已经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教过书，成为口碑较好的作家，此时又在为南京政府编辑小学国文教科书，他面对熊希龄已经不再有心理落差。也正因为熊希龄在沈从文的生活中有了越来越多的痕迹，印象渐好，他在用三周时间一挥而就的《从文自传》中对于当